

評介荆子馨《變成「日本人」：殖民地的台灣與認同形成的政治》

陳 德 智 *

Leo T. S. Ching (荆子馨), *Becoming "Japanese" :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xii + 251 pp.

荆子馨，於1994年，取得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博士學位。現任美國杜克大學亞非語言與文學系副教授。研究專長包括殖民論述研究(colonial discourse studies)、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 theory)、日本大眾文化(Japanese mass culture)以及全球化與地方主義理論(theories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sm)。Becoming "Japanese" :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暫譯《變成「日本人」》)是其第一本專著，亦是新著。本書除去序和導言，正文共分五章，連附註、參考書目、索引共252頁。以下先簡介本書的各章要旨，再提出個人的淺見。

作者以1979年2月24日早晨開始的一個事件作為導論的開頭。七個台灣原住民前往日本的靖國神社，要求神社將他們家屬在神社中的牌位歸還。但是神社方面認為按日本習俗，戰時為日本捐軀的亡靈都奉祀在靖國神社中，要歸還台灣原住民親人的亡靈是不可行的。原住民們憤怒的表示，過去戰時受日本無情的利用，現在絕不再如此。因此更激烈表示，除非討回亡靈，否則絕不離開。上述兩方的相遇，體現了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在後殖民的情境下的相遇畫面。藉此，作者認為，「沒有活的像日本人，卻死為日本人」的邏輯下，存在著一個重要卻常被

*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忽略的事實。由於日本的「同化」政策與「皇民化」政策都促使被殖民者變成「日本人」，但這「被自然化的」日本人和「自然的」日本人之間作為公民的政治經濟權利的不平等，被突顯了出來。作者指出，這一顯而易見的現象卻消除了帝國底下那些非日本人的公民權的基本問題，即（經由同化的）「日本人」與（在皇民化下的）「帝國臣民」的分類是被建構與被動員的。（頁 6）作者不打算寫一部廣泛理解殖民地認同的歷史，而是去歷史化那些可能性的情況。因此，作者主要是有目的的和策略性的選擇文本和事件當作對象，而能最好地呈現與再現殖民地台灣的認同形成。

首章，作者先就日本的殖民主義研究做了討論。作者欲於本章挑戰將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特殊化的做法。作者同意地方化的理論與歷史地特殊描述能提供更具有洞見的研究成果。然而作者想強調的是在全球的資本殖民主義的普遍性中，這個特殊的日本個案中的相互關係(interrelationship)與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y)。其次，作者論及由於日本帝國解散造成的解殖過程的缺乏，使得台灣與日本都沒有面對他們的這段特殊的殖民關係和整個日本殖民的遺產（頁 20）。接著作者就日本殖民主義的形式、內容，和與其他殖民主義的相似與差異處討論。最後作者提出其主要論點，在於解殖(decolonization)作為描述與分析的分類，和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對比之下，提供了對日本對戰時的罪惡與殖民持續地逃避此一現象，有著更好的理解。日本於二次世界大戰被擊敗後，其帝國幾乎是瞬間消失。日本接下來也避免了令人折磨地政治與文化的解殖過程。作者指出，日本帝國先前的殖民地的重組，是委託同盟國的力量達成，特別受到美國政策，以及後來冷戰的地理政治學影響。戰後的日本因此可以敘述一段歷史——一段從失敗到去軍事化，再復甦至創造經濟奇蹟的歷史。而這樣敘述的歷史卻也逃避了殖民的種種問題。由是，作者以川端康成的小說《雪國》暗喻了一個女性化與無助的日本形象作結，說明了戰後對日本殖民地研究的困難，遭受了西方的困擾與日本對殖民的問題的否認，極危險地會成為一種補償而不是批判（頁 49）。

第二章中，作者企圖分析有關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爭論的形成。從 1920 年代起他們各自的政治運動，以及他們的對今日的迴響與影響。作者認為對種族中心的分析應該放在他們當時可能性的情形下的階級基礎上質問。於是提出了以台灣為中心點，以中國和日本作為橫軸，以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為縱軸的圖表。接

著作者針對 1980 年代以後出現的所謂中國中心與台灣中心的爭論作了分析。王曉波對於日治時期的政治運動中所為台灣派與祖國派的分法感到不以為然，王曉波以一種漢民族中國人的意識來說明不論是哪一派都含有這種意識。然而歷史事實是，日治後期中國意識與台灣的連結愈來愈薄弱。作者認為，這個歷史上中國性在台灣意識裡意外又特殊地顯示，會繼續與漢民族意識持續、不矛盾和補充地保持關係。台灣意識的假設正在其源頭的隱藏之上。另一方面，宋澤萊和史明則將重心放在描述台灣人的主體意識上。宋澤萊透過強調台灣的物質基礎與生產關係決定了台灣的本質，因此其發展出來的台灣意識不會有中國意識。史明則透過弱化中國意識，強調中國是抽象的，而台灣則為具體的存在，再一次喚起台灣與中國分離的事實。作者指出，黃昭堂認為台灣島上的住民認識到自己是台灣人時，應該從殖民者為另一個民族—日本—組成時才意識到。就這一點說來黃昭堂的言論引導了我們發現對「台灣人」的注意是始於與「日本人」的矛盾，而不是對與「漢民族」的關係。因而，作者認為對台灣認同形成的認識，應離開國族主義朝向殖民主義(頁 81)，並加上重視帝國和階級關係的因素(頁 86)。

第三章，主要是對同化與皇民化的日本殖民論述作理論的分析。作者首先指出「同化」與「皇民化」兩者間的不同。作者認為視「皇民化」起源於「同化」，或視之為「同化」的延展，沒有什麼基本上的錯誤。然而，如果理解「皇民化」卻銘刻於「同化」的邏輯之中，對「皇民化」此字僅理解為用來形容發生在 1937 年之後的殖民政策，並且僅指涉對日本在中國與東南亞的軍事擴張脈絡的理解，那就錯了(頁 95)。因此，作者不僅要勾勒出「同化」與「皇民化」殖民地政策操弄的歷史，還要追尋政策與被殖民者的相互關係，看被殖民者在殖民主義下的反應。作者認為，「同化」政策一開始並未被採用，這也是一個與「皇民化」很大不同之處。當「皇民化」很明確的要求所有的被殖民者變成日本人時，「同化」仍只是一個很大很模糊的計畫。同時「同化」的矛盾也是亟待解決的，例如「什麼才是日本人國族的本質，以及什麼構成日本人國族認同的基礎？」但日本殖民主義卻透過「差別待遇的同化(discriminatory assimilation)」此一特殊的機制達到其目的，即不清楚地區分自我與他者的分別，透過使他者看不見，也使得同化與差待遇的察覺被壓制，服從與調和兼具。因此「同化」的可能性便建立在其不可能之上，即建立在政治的不平等與文化的融合之間的張力上(頁 113)。然而，「皇民化」

既不是「同化」在邏輯上的延伸，也不是突然的增強。作為一種殖民的意識形態，「皇民化」消除與抹去「同化」的內在矛盾，強勢劇烈地改變與限制殖民地主體的行為，即變成日本人。於是，「日本化」帶來了真正的認同問題，在外表行為都「日本化」之後，被殖民者都被視為不完全的「帝國臣民」。作者認為，在這樣的特殊時空下，對於認同的掙扎才在殖民地台灣成為支配的論述（頁 132）。

第四章，作者主要將「皇民化」的分析延伸至台灣原住民在 1930 年所發生的霧社反抗事件上。作者首先是描繪出殖民政權面對最危險的叛亂在適應與壓制上的轉變。作者指出事件發生後的官方論述與非官方論述間的不同，在於官方強調事件暫時的與意外的事件性質，而非官方論述則重視霧社事件發生的長期結構因素，進而對官方進行批判。然而，上述兩者儘管立場不同，但同樣都以「自我/他者」、「統治者/被統治者」、「日本人／野人」等二元對立的概念來思考問題（頁 148）。作者企圖從中為這些原住民求得其他選擇的可能性。透過對〈野蠻人〉、〈吳鳳的故事〉和〈莎勇之鐘〉的分析，作者指出，在文明中發現野蠻其實是更鞏固與延伸了假定野蠻被排除於文明之外。對於從強調吳鳳到莎勇的轉變更是，展現了前者重視的是原住民部落與其他非原住民的文化差異，而且越來越強調吳鳳犧牲的道德意義。莎勇的神化過程更是強化了為國家而死得救贖的觀念的傳播。最後作者指出，成為「日本人士兵」—即「自願者」，是在霧社事件後成為或許更好政治經濟條件的唯一途徑。因此原住民的認同未必在文化政治學的「差異」中表現出來，而有可能是在殖民主義之下增加其認同疏離與碎化的負擔。

第五章又回到在殖民地台灣、帝國主義的日本和民族主義的中國之間的三角關係。透過對《亞細亞的孤兒》的分析，作者認為此作品具台灣在殖民統治的增強和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幻滅下，逐漸「達到而成存在(coming into being)」的寓言。作者指出《亞細亞的孤兒》標誌了太平洋戰爭緊張的這一歷史時刻，日本殖民政權限制了任何革命或者改革措施的可能性，而中國與中國民族主義也不再提供對台灣的解放有什麼清楚可見的改變。殖民主義給認同的掙扎套上了框架，對台灣島上的被殖民者而言而言是「日本人」或「台灣人」，以及「中國人」或「台灣人」的虛假的選擇。因此理解「剛出現的」台灣認同，其實並無特定的策略，而應同時理解與形塑那「剩餘的」中國文化主義與「支配的」日本殖民主義。也因此，這劇烈的意識是掙扎於一個具有閹限的空間，同時具有反結構的暗示，介於個人

與歷史之間的區域，在這區域中，這意識能朝贖罪的實踐而努力（頁 210）。

首先，本書將認同放在歷史的脈絡中進行理解，是一個主要特色。西方歷史學家開始對西歐中心論表示懷疑，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開始的。目前，後殖民主義的研究正逢潮流，與後現代主義對西方文化的批判交相呼應。西歐中心論搖搖欲墜，已經不再有什麼市場。¹但隨之而起的後現代主義或者後殖民主義是否就能處理的更好？後現代主義者把西方所關注的問題普世化了，這一點特別反映在他們在認識論問題上的「著迷」和「焦慮」，這樣的傾向與「東方主義」很相似，雖然這正是他們歷來所批判的。²如同薩伊德的主觀主義認識論與吉爾茲狹隘的後現代主義的地方性知識根本就不能包括我們所必須面對的問題。當把事實化約為單純的主觀再現時，他們拋棄了對歷史研究實踐來說至關重要的真理理念。³於是，荆著《變成日本人》一書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可說是掌握了至要的關鍵，回歸到殖民地本身的歷史過程，進行研究。而且對帝國／殖民主義研究來說，《變成日本人》研究的也是唯一非西方的帝國主義國家。於是在研究課題與方法上，荆著都可為有著極重要的代表性貢獻。

其次，本書追溯對日治時期的殖民政策的延續與轉變，提供了很具洞見的看法。過去對同化與皇民化的理解不脫以下的認識：皇民化被理解為用來形容發生在 1937 年之後的殖民政策，並且僅指涉對日本在中國與東南亞的軍事擴張脈絡的理解。因而，皇民化也就在同化的邏輯下被認識。然而荆著卻透過分析同化與皇民化兩者內在邏輯的不同，得出重要的結論，即對內心認同掙扎的論述始自皇民化（頁 132）。這個發現對於我們對認同的理解有著很大的幫助。由於認同的掙扎被析出了殖民主義的作用，那麼對於戰後爭論不休的中國或台灣意識的問題就有了釐清。顯然，此時期殖民主義的力量佔據了支配性的地位。加上，戰後日本帝國的瞬間消失，所帶來的事解殖過程的缺乏。那麼台灣島上過去的被殖民者，如

¹ 王晴佳，〈如何看待後現代主義對史學的挑戰？〉，《新史學》10 卷 2 期（台北：新史學雜誌社，1999 年 6 月），頁 130-132。

² 黃宗智，〈導論〉，《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5。

³ 黃宗智，〈導論〉，頁 5；黃宗智，〈學術理論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四個陷阱和一個問題〉，《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122。

何看待自己？看待這個突然被解殖的自己？於是，台灣島上的認同顯然有著自身的特殊性，不是中國中心或台灣中心思考的統獨極端思考可以處理的。荆著所提出的重要看法，對當下台灣國族認同的凝聚有著具啟發性的視角。

再次，對原住民認同的考察，提供了新的視野。本書對原住民的考察，包括原住民作為少數與邊緣的一群人為研究對象，以及另一種的除了殖民/被殖民以外的另一組二元對立——文明／野蠻。以對少數族群具體的研究，豐富了認同研究的內涵，並且使得我們在認識台灣的認同問題時，不至於再次落入漢人沙文主義的迷思中。

除上述諸項特點外，依筆者淺見，本書或許仍有幾處可加以商榷之處。

首先，日本真的有逃過殖民地解殖的過程嗎？作者在本書的第一章中點出這個對於台灣認同研究至為關鍵之處，認為日本帝國在戰後的特殊的國際情勢與歷史發展下，其戰時對其鄰國所應負的責任的問題未獲得解答，也因此逃避了殖民地的問題。在這個脈絡下，作者提出對日本殖民主義的問題才被突顯出來，例如對中國意識的未決定性、同化與皇民化內在邏輯的差異與影響，以及日本統治下的原住民認同的這些研究才更為突顯。但是，日本至今為周邊國家所顧忌，如要求日本在歷史教科書中面對其戰時的行為，以及慰安婦請求賠償的事件，這都表明了日本並沒有如荆著所謂「避免了政治與文化地受折磨的解殖過程」（頁 12）。因此，筆者認為，與其說日本僥倖地逃過殖民地解殖的過程，不如說日本一直困在解殖的情境中，進退維谷，至今仍沒能獲得解決。日本的殖民主義歷史的解殖過程，是有自身的特殊性的，無從和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解殖過程相比擬。如果在與其他西方殖民主義相較下而得出，日本逃過了殖民地解殖過程的結論，事實上這可能是另一種西方中心觀的錯誤所致。

其次，作者是對於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理解似乎過於簡化。在書中，作者提供了一個對台灣反殖民運動的分類圖。以台灣為中心，橫軸的兩端分別是中國與日本，縱軸的兩頭為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頁 55）。橫軸的兩端作為民族主義傾向的光譜，筆者認為並無太大的疑慮。唯縱軸以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為極點來處理台灣反殖民的運動，筆者認為不甚妥當。即便當時的不少政治社會運動後期有呈現左傾的現象，又或者誠如作者認為「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分別是台灣反殖民運動的兩個支配性的趨勢」（頁 53），然而當時的政治社會運動很大的程度上

是和民族主義一同運作，即便是「左傾」未必可以等同於向馬克思主義靠攏。因此，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否能夠被放在同一條軸的兩端，顯然是有待商榷的。

其三，對於霧社事件的思考仍停留在以國家與個人為單位的思考上。雖然《變成日本人》並不以討論霧社事件為主，且筆者認為荆著將認同的考察對象放到原住民上已經做出了貢獻。儘管如此，筆者仍需指出荆著對於霧社事件的探討與其他各章相同，都重視在殖民主義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國家與個人間的關係。這時會出現一個問題，即研究的對象—被殖民者（包括漢人與原住民）—並不被加以區分的變成鐵板一塊，其認同也遭到同樣的對待。雖然荆著專章以霧社事件討論了原住民的認同，也提出了其中文明/野蠻的二元關係的分析。但是，忽略了原住民在政治單位上以部落為單位，於是當霧社事件發生的當下，以及霧社事件發生之後的情形，是否應以部落作為第一優先的觀察對象，而非以個人認同為第一優先。在荆著中我們沒有辦法認識部落在面臨「變成日本人」時的意義，只看到原住民從「叛亂者」變成「自願者」，彷彿部落之於日本政權（國家）與原住民（個人）一樣沒有意義。於是，霧社事件也只可能是國家觀點下的叛亂，部落間的出草習性只作為文明/野蠻間對話的一小段插曲，與原住民的認同無涉。

最後，本書有一小錯誤，作者在 163 頁處寫道「莎勇的平民的特徵被用來在殖民地媒體強調她年輕與純潔的方面」其中平民的應拼作 *plebeian*，而書中作 *plebian*。